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05 月 (总第九期)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 2009. 05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433)

目 录

一、	五月学术工作.....	3
二、	学术出访.....	4
	◇ 高研院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光华法学院访问	
	◇ 邓正来教授做客中国海洋大学人文讲坛	
三、	学术来访.....	6
	◇ 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王芳女士来访《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	
	◇ 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 Stein Tønnesson 博士来访高研院	
四、	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刘清平教授主讲“儒家伦理的悖论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	8
五、	邓正来教授应邀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	10
六、	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	11
	第十二期：Jan Pakulski 教授主讲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	
	第十三期：秦亚青教授主讲“关系、过程与社会建构：兼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理念”	
七、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16
	第十三期：周国平教授主讲“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	
	第十四期：陈嘉映教授主讲“谈谈语言转向”	
八、	双周学术午餐会（第五期）.....	20
九、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第八期）.....	21
十、	媒体报道.....	23
	《社会科学报》刊发“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论文	
	《社会科学战线》刊发邓正来教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 五月学术工作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 学术出访：高研院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光华法学院访问；邓正来教授做客中国海洋大学人文讲坛；
2. 学术来访：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王芳女士来访《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 Stein Tønnesson 博士来访高研院；
3. 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刘清平教授主讲“儒家伦理的悖论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
4. 邓正来教授应邀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
5. “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举行第十二期：Jan Pakulski 教授主讲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第十三期：秦亚青教授主讲“关系、过程与社会建构：兼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理念”；
6.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举行第十三期：周国平教授主讲“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第十四期：陈嘉映教授主讲“谈谈语言转向”；
7. “双周学术午餐会”举行第五期；
8.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举行第八期；
9. 相关媒体报道：《社会科学报》刊发“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论文；《社会科学战线》刊发邓正来教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05-31

二. 学术出访

高研院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光华法学院访问

2009年5月4—5月5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邓正来教授、郭苏建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王勇博士、孙国东博士与高研院办公室成员陈晔、黄倩等高研院全体成员应邀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光华法学院进行学术访问。

5月4日晚,高研院全体来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郁建兴教授、郎友兴教授、苏振华副教授等接待了高研院一行。双方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学术发展状况,并就如何加强高研院与浙大公共管理学院之间的学术合作(特别是如何加强政治哲学层面的探索与政治科学层面的研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进行了探讨。当晚,邓正来教授还应邀为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演讲。



5月5日下午,高研院一行来到位于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光华法学院访问。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罗卫东教授,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朱新力教授、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毛丹教授、光华法学院钱弘道教授、公共管理学院余潇枫教授等会见了高研院一行。罗卫东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状况,尤其是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在

组织跨学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会谈中,罗卫东教授在与浙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模式的对比中高度赞扬了复旦高研院以“学术特区”模式在推进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并与邓正来教授就社会科学评价机制的完善、杰出社会科学人才的发掘与培养、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社会需求与内在知识场域自主性之间的良性互动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还就高研院与浙大社会科学研究院、光华法学院等之间的学术合作进行了初步的商谈。

此前，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原创》主编吴炫教授也代表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会见并宴请了高研院一行。

邓正来教授做客中国海洋大学人文讲坛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结构关系、中国自身结构这两个问题更加凸显，中国社会科学处于知识转型阶段，而面对知识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呢？5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客由我院和文科处主办的海大人文讲坛，给同学们带来“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专题讲座。



邓正来教授首先分析当前社会背景，指出全球化不可避免，中国和世界的结构关系、中国自身结构均存在诸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亟需进行知识转型。他从中国与世界结构关系的发展阶段讲起，说明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1840年之前极少交流；1840年后中国门户被打开，进入世界但并没有进入世界结构之中；1978年后至今，中国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以前中国是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游戏’之外，发言不发言不重要；现在，中国终于有对世界结构问题发言的资格和身份，却发不了言。”邓正来教授紧接着解释说，是因为中国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后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按照主权平等原则进入，却发现世界结构有中心、有边缘，且并不按主权平等划分位置；二是中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即遵守既有“游戏规则”，但发不了言。他分析说，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不曾认真研究过中国及世界的未来理想图景，同时只是“关着门”搞研究，很少有学者把全球化作为学术研究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被世界引证的研究。”他举此例说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化思想，因此在西方只是“only the better”的制度却作为“the best”被引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制度创新能力。“西方化把中国给弄没了，而伪学科化把中国给‘肢解’了。”他这样形容中国社会科学现阶段存在的两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化趋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知识引进阶段、复制阶段和与国

“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被世界引证的研究。”他举此例说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化思想，因此在西方只是“only the better”的制度却作为“the best”被引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制度创新能力。“西方化把中国给弄没了，而伪学科化把中国给‘肢解’了。”他这样形容中国社会科学现阶段存在的两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化趋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知识引进阶段、复制阶段和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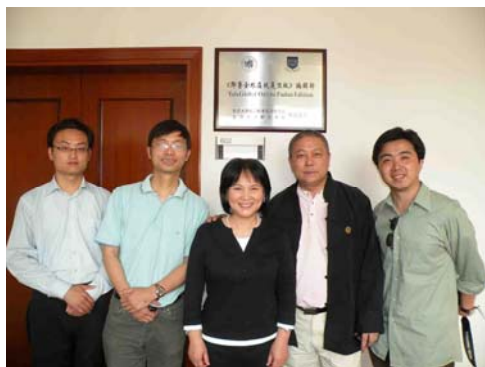
际接轨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科学从无到有，逐渐懂得基本学术规范，但我们没有真正认识这些问题，不了解知识的品质，没有自己的理论，同时在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看问题时，每一个学科分支都没有达到足够独立，以至于“只看到碎片的中国，而不是活生生的中国”。而且，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割裂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不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要进行知识转型。

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邓正来教授说自己主张无学科模式，破除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重新发现中国，从而逐渐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为世界知识殿堂做出贡献。

讲座最后，针对“理想图景不是实际问题，可能无法实现”等问题，邓正来教授做出详尽解答。我院院长徐祥民总结此次讲座时说：“中国应不止走进世界结构，更要为其服务并发展世界结构。希望大家克服当前学术浮躁氛围，重视文科发展，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术精神及责任感，创造出良好的学术环境。”

三. 学术来访

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王芳女士来访《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



5月10日下午3:30，美国耶鲁大学中国事务主管王芳女士来访复旦大学，《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编助理邓建国博士、沈国麟博士和编辑助理李明等与王芳女士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建设、开通仪式等事宜进行了会谈。复旦大学外事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庄辉副主任参加了会谈。

在复旦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耶鲁大学各方的关心和努力下，《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建设进行得非常顺利，网站基本框架已经建成，编辑部已经完成了重要稿件的翻译、编辑和上传工作。自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达成合作建设《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协议以来，复旦版编辑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翻译人才对耶鲁全球在线的重要英文稿件进行了翻译和编辑，目的在于向中文世界介绍全球化的热点问题以及全世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两家单位的鼎力支持



下，编辑部力图把《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建成一个东西方关于全球化的交流平台，把中国人的全球化视点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向世界。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落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 602 办公室。王芳女士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同仁就办公设施、网站建设和文稿编辑等具体工作进行了沟通，尤其就网站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交流，对开通仪式的准备工作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就有关问题的处理达成了共识。大家相信，复旦版编辑部与《耶鲁全球在线》编辑部一定会在互惠互信的基础上，把《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讨论全球化的网站。



会谈前，在邓正来教授等陪同下，王芳女士参观了“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办公室。

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 Stein Tønnesson 博士来访高研院

2009 年 5 月 21 日下午，历史学家、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前所长 Stein Tønnesson 博士在复旦大学北欧中心访问之际，专程来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访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会见了 Stein Tønnesson 博士。双方就东亚和平与安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讨论，并就高研院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学术合作进行初步商谈。



Stein Tønnesson (1953—)，系挪威奥斯陆大学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SUM)]人类发展研究教授，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北欧亚洲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for Asia Studies (NIAS)]资深研究人员，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越南革命和越南战争、东南亚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南中国海冲突、挪威运动史等。晚近以来，主要致力于全球史、全球化问题和 1979 年以来东南亚和平问题等的研究。

四．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

刘清平教授主讲“儒家伦理的悖论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

5月19日晚6: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高研院新引进的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博士, 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参加讲演仪式。



讲演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刘清平教授的个人简历、研究领域和成果, 介绍了点评嘉宾洪涛博士和任晓教授。

讲演前, 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刘清平教授颁发了专职研究人员聘书。

接着, 刘教授做了题为“儒家伦理的悖论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的讲演。他开明宗义地指出, 正当与善的关系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而本次讲演则试图从分析儒家内在包含的“仁孝”悖论入手, 为“正当优先于善”的观点提供一种肯定性的论证。刘教授认为, 如果我们像儒家那样不是赋予正当以优先性, 而是把另外某种善凌驾于正当之上, 便会在冲突情况下导致正当被这种善所否定, 以致陷入“不是爱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或曰“侵害人的基本权益”——这种人类生活中不可接受的绝对恶或“元恶”。

在具体界定了“正当”与“善”等相关概念, 并且说明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的基本含义之后, 刘教授通过对“孝”在儒家伦理中的优先性理论分析, 通过对儒家诸子语录的分析, 指出了儒家思潮特别强调孝悌这种血亲之善的重大意义。就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指出, 一旦儒家伦理把孝悌视为仁义的惟一性本根基础, 并因此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将其绝对性地凌驾于具有“正当”意蕴的仁义原则之上, 那么, 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它必然会陷入为了维护孝悌之善不惜否定仁义之善, 甚至鼓励人们出于孝悌动机从事坑人害人的不正当行为的深度悖论。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悖论，刘教授指出，如果每个人的应得基本权益都能够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其他任何一种善的相对缺失，诸如某个人的一己利益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没有彻底实现等等，都不过是人类生活中可以容忍的不完美或缺陷。在人类生活中，只有实质性地侵害人的基本权益才是一种无条件的终极恶，只有实质性地尊重人的基本权益才是一种无条件的终极善。事实上，任何一种善，无论是某一个体意欲的私己善、还是某个社群意欲的共同善、或是全体人类意欲的普遍善都必须符合正当之善、以正当之善作为前提条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反之，任何一种善如果违背了正当之善、突破了正当之善的终极底线，都会沦为不能宽容的绝对恶。



刘教授讲演之后，洪涛博士首先做了点评。他首先指出，肯定刘教授讲演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尤其是刘教授关于正当之善的终极性的论断。但是，洪博士也就刘教授所引用的一些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刘教授所引用的一些案例的解释力提出了商榷意见。最后，他指出，对于刘教授的“正当之善”，儒家思想应该可以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任晓教授接着做了点评。他指出，刘教授的讲演有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其推导出的结论有着清晰的前提。但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的价值冲突，如公平与效率等。而这种具体的冲突未必遵循一个固定的价值序列，它与具体情境有关。另一方面，任教授也提出，正当与善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一对范畴，在分析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的时候，这种复杂性会更突出。



点评之后，在场学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 and 存在的疑惑进行了提问。如，正当对善的优先性的根据，如何看待经由概念来涵括的中西具体伦理思想，如何看待宋明理学以降的义理转变等等。刘清平教授一一做了解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是高研院常规性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讲演气氛热烈，观众参与踊跃。刘清平教授把正当与善的问题引入中国古代伦理问题的分析，并使儒家的经典教义在一种全新的框架中获得了分析，既突出了中国古代人伦政制的独特经验，同时也较为清晰地开示了其内在的价值紧张和伦理错

位。刘教授的理论分析以及评论人和观众的讨论开放出了很多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附录：刘清平教授就职感言

尊敬的邓正来教授、高研院的同事们、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此时此地，能够成为复旦大学高研院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我深感荣幸，并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和高研院的各位领导、同事同学、尤其是邓正来教授对我的信任和期许。

此地此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身为复旦大学高研院这个学术社区成员的严肃职责，容不得半点马虎。其实，我之所以对高研院心向往之，主要原因就是我充分认同它“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的理念和“追求学术卓越”的传统。我生来别无它长，命中注定只能从事学术研究，同时又生性使然，打心眼里欢喜学术研究，从中获得莫大快乐。当然，我更持有一种信念：学术研究并非一场自娱自乐、玩玩而已的轻松游戏，而是一项浸润着对国人对人类艰穆使命的承重事业。

有鉴于此，作为复旦大学高研院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我将坚持以“消极学术”的标准和“积极学术”的目的要求自己，在恪守不抄袭、不剽窃、遵守学术规范的底线基础上，尽力做出有新意乃至有原创性的扎实成果，使之在思想史长河的冲刷下不是昙花一现、而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借此回报复旦大学和高研院对我的信任和期许。

再次向大家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五．邓正来教授应邀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

2009年5月19日15:00，应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客“学养拓展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辅楼103教室为广大复旦学子做了一场题为“如何学习与读书”的讲演报告。

首先，邓教授结合自己的读书和研究经历，通过事例分析的方式和学生交流了为什么要学习和读书的问题。第一，学习和读书时与个人生命息息相关的。由于一个人的经验有限、理性有限，所以每个人要掌握和学习知识。第二，学习和读书是时代赋予的使命。邓教授指出要对当下读书和学习有一个背景结构的基本认识 and 意识正是这一时



代赋予了读书人特殊的使命。

接着，邓教授通过“八个关键词”与在场听众叙述了怎样去学习和读书。第一、“追比圣贤”，要有追比的榜样，追求好的学问；第二、“关注知识”，提出要通过学习知识来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知识有限度，知识绝不是真理，知识是可以被反思和批判的；第三、“认真的品质”，读书需要规训，要养成品性；第四、“关注中国”，知识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注重主体性的中国；第五、“深度读书”，要深入研究，为自己的研究收集完整的资料；第六、建立“读书小组”，注重知识上的团结，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第七，“学术传统”，关注传统，注重理论的构建；第八，学习和读书中五个层面的问题，即：理论的枝节问题；理论的结论问题；前提和结论的论证方式问题；对前提本身的研究问题；前设(pre-assumption)的研究问题。



讲演结束之后，邓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诸多问题，如读经典著作与学习跨学科知识的问题，怎样做好读书笔记，怎样提高读书效率，读书的时候怎样才能确立真正的问题，怎样进行精读，怎样进行学术写作等等。邓教授都给与了耐心的解答。

讲演过程气氛热烈，整个教室座无虚席。通过讲座，邓教授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和同学们交流了如何学习与读书，给了在场听众以指导，使得听众对读书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六．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

Jan Pakulski 教授主讲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

5月12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二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Jan Pakulski先生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郎友兴教授担任论坛点评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首先，邓正来教授介绍了讲演嘉宾 Jan Pakulski 教授，论坛点评人郭苏建教授和郎友兴教授。

接下来，Jan Pakulski 教授做了题为“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Elite and Societ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Elite Theory and Research)的演讲。Jan Pakulski 教授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古典精英理论的基本信条和当代精英理论的主要贡献及其特征。

他认为，古典精英理论有四大信条：第一，也是古典精英理论最为独特的信条，即权力分层呈极化、对精英之普遍性的坚持以及视精英的特质为关键的解释性变量；第二，掌权者们的自我组织以及协同行动、具有凝聚力的紧密团结的能力；第三，精英和“诸种社会力量”(占支配地位的阶层、运动、阶级和族群)之间的关联；第四，准入途径和更替，能否进入精英阶层取决于是否获得一定珍贵品质（例如，财富，特权以及愈来愈重要的教育），而且进入通道受到现行精英直接或间接的严格控制。



通过与古典精英理论的对比，Jan Pakulski 教授阐述了当代精英理论的四大重要结论：第一，在使精英们一体化的过程中，在精英合意和大众同意的产生和永久继续的过程中，以及在确保政策的协调性的过程中，政治领袖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平衡”的精英结构，即在构成精英群体的关键团体之间/之中的关系模式；第三，精英的“程序性”合意，亦即对于政治盟约之规则的共同看法和尊重，被广泛认为是持久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条件；第四，新精英招募和精英循环。



讲演结束后，郭苏建教授首先做了点评。郭教授总结了 Jan Pakulski 教授的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阐述了精英理论的发展现状和优点，并特别指出了精英理论本身可能存在的缺憾：第一，忽略了政治精英背后的力量博弈，特别是其背后阶级和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第二，威权政治体制下精英的运行是暗箱操作，很难真实地了解精英运作情况。



接着，郎友兴教授做了论坛评论。首先，他在同新制度主义、转型理论等政治学研究路径相对比的视角高度评价了精英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了从事精英理论研究可能面临的理论困境；但他强调：从逻辑的层面上来讲，精英理论的框架的确会丰

富我们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与美国这样较为定性的国家相比，就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精英理论的视角可能要比新制度主义路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点评后，在场听众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如：如何看待女性精英理论问题，精英理论如何看待韦伯意义上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区分，精英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指出：当我们解释一个整体性进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结果主义的角度来看的；但无论是精英理论还是其他理论路径，它们看似不同但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假设，即中国改革的结果乃是参与改革的各种力量经由理性设计而达致的一种事先就可预见的结果，而这则完全忽视了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因素和非意图结果（unintended result）的重要性。



秦亚青教授主讲“关系、过程与社会建构：兼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理念”



2009年5月14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十三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志敏教授应邀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出席论坛的讲演嘉宾秦亚青教授和评论嘉宾沈丁立教授、陈志敏教授。接着，邓正来院长代表高研院为秦亚青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聘书，为沈丁立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的聘书。



在题为“关系、过程与社会建构：兼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理念”的讲演中，秦亚青教授在分析西方主要的国际关系（IR）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关系性”为视角建构新的IR理论的可能性。他首先分析了西方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第一、结构现实主义，即强调“结构选择”；第二、新自由制度主义，即强调“制度选择”；第三、结构建构主义，即强调“文化选择”。接着，他指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即缺少了中国人很注重的“关系性”。

在演说中，秦教授以图解的方式演示了其所主张的过程关系主义IR理论的构建过程。他认为，以物质的和社会的因素为横轴，以结构的和过程的因素为纵轴，两者可以构成一个知识谱系图。在该谱系图里，已有的三大IR理论模式结构现实主义即结构理性主义(structural rationalism)、新自由制度主义被即过程理性主义(processual rationalism)、结构建构主义即观念理性主义(ideational rationalism)与他所建构的过程关系主义(processual relationalism)一起正好构成了四个不同向度的理论努力方向。

秦教授详细分析了界定理论的核心概念，即“过程”process的概念，他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赋予“过程”以本体地位，“过程”本身应该是自在的自为的，必须具有本体地位。“过程”有三大特征，即过程和行为体是同时产生的；主体兼性和互动活动在过程之中实现的；具有中国的辩证法的特点。此外，“过程”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培育集体情感，而关系性恰恰就是要谈情感。因此，秦教授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因素，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化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理论贡献的地方。



沈丁立教授首先对秦亚青教授的讲演进行了点评。他首先指出秦教授在国际关系领域所做出的理论探索的贡献和重要性。沈教授强调了把“关系”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时所可能具有的创新意义。他指出，随着市场经济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多现象已经无法用原来的理论来解释，这就需要我们用中国的经验、创新性的中国理论来建构新的解释。秦亚青教授

的讲演从点、线、面依次递进的方式进行了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沈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秦教授的讲演强调了他自己对西方理性说的分离，但是“关系”是否一定就是非理性的？

接着，陈志敏教授进行了学术点评。他提出了三点，第一、秦教授的一系列论作及今天的讲演是中国学者尝试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是极具前沿性的理论建构；第二、这种努力是构建能够展示中国特色，切合中国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把传统经验中的概念作为建构新的理论的一部分，拓展了理论的解释力；第三、更为有意义的是，这是一种试图在更普遍的意义建构一种一般性理论的尝试。就秦教授的讲演，陈教授也提出了疑问，第一、国外的理论中是否缺乏关于“过程理论”的研究。第二、“关系”这个概念或理念如何操作，如何证明它是自在的或自为的。



讲演之后，在场听众针对秦教授的讲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如儒家文化对建立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作用，关系的流动性问题，集体主义情感与过程模式的形成，国家领土归属权纠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等。秦教授都逐一做出了回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首先指出秦教授的理论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开端；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共同的特点即在于强调理性，这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拟人化的结构，它们被假定是有理性的，是由利益支撑的、可以计算利益得失；第三，而就“关系”的理解问题，中国人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的，不是群体的，更不是国家间的。中国人的关系和西方的 relation 不是同一个“关系”，这就牵涉到不同性质的关系纳入国际视野、纳入不同文化的问题；第四，邓教授强调任何理论都是有限度的，正是这种限度提供了给人们批判的可能性。

本次讲演秦教授展示了自己理论构建的过程，使得在场听众体会了秦教授理论推理的严密逻辑和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同时，通过现场讨论，领会到了理论的限度性和学术批判的重要性。



七.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周国平教授主讲“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

2009年5月20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202报告厅举行第十三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双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讲演前，邓正来教授简要介绍了周国平教授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代表高研院为周国平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的聘书。



接下来，周国平教授发表了题为《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的讲演。首先，周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译介和研究尼采哲学的经历，并且通过梳理代表性著述的方式交代了尼采思想的发展历程；其次，周教授指出，分析和研究尼采的思想，应该以问题入手，看尼采究竟关心什么问题，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就此，周教授把对尼采问题的追究置于西方文化发展历史中，他指出，尼采文化观的两个思想来源，即希腊神话和悲剧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尼采认为，文化是贯穿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的生活的统一风格，而“文化的目标是要促进真正的人的产生”。由此，周教授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尼采关于现代文化的批判方面。他指出尼采关于现代文化基本特征概括：1、内在的空虚和外在的匆忙。2、精神的贫困和知识的贪婪。3、人格的虚假与包装的狂热。4、艺术的堕落。

第三，通过解剖现代文化的主要表达者或文化主角来分析此种空虚和堕落，即学者、媒体、商业和政治；最后，周教授分析了尼采现代教育批判思想。现代教育存在两种倾向，但其结果却是合流的，即扩展规模，增加数量；缩小内涵，降低质量。放弃崇高使命，纳入谋生和为国家服务的轨道。“通过今天高等教育

者的努力，培养出来的是学者、政府官僚、营利者或文化市侩，或者，就最后和通常的结果而言，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

讲演结束后，现场听众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问题，如，如何反向来看待尼采所批判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学术研究中具体切入问题；尼采著作的阅读和理解顺序；如何评价目前的尼采研究状况；如何理解学术研究中的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学术思想以一种极具建设性意义的方式融入现代教育当中，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来自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高校和单位的同学和老师前来参与本次讲座。他提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尼采的文化批判背后所隐含的知识批判的有效性问题的，而这并不是用简单的“虚无”或“野蛮”所能够涵括的。同时，人的生命中除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这类价值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



本场讲座气氛极为热烈，四百余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周国平教授结合其关于尼采文化批判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批判视角，使我们对现代社会状态和精神生活的理解获得了又一个参照系。

陈嘉映教授主讲“谈谈语言转向”

2009年5月25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举行第十四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双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博士，同济大学哲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博士应邀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讲演前，邓正来教授简要介绍了陈嘉映教授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代表高研院为陈嘉映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的聘书。

接下来，陈嘉映教授发表了题为《谈谈语言转向》的讲演。首先，他指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以及一般人文学科中的语言转向，涵盖了哲学以及几乎各个文学学科，甚至也包括很多社会学科。简单地说，语言转向即哲学不是关于事质的研究，而是关于语言的探索。追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真理、时间，而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真理、时间这些词是怎样用的。所谓“研究”真理，只能是说，研究在种种情况中，怎么确定某物某事为真的。



第二，陈教授指出，语言转向意味着区分事质研究〔事实研究〕和语言研究〔概念研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即来源于混淆科学研究和哲学探索。事质研究和概念研究区分的大背景，语言转向的大背景，是科学探索与哲学研究的分野。真理、实在等等仿佛是宇宙中的一些最普遍的存在物，于是，研究这些存在物，获得关于这些存在物的终极的、惟一的真理成为哲学的目标。这样理解哲学工作和哲学真理，即形而上学。

第三，陈教授通过举例阐述了语义上行的问题，语义上行的要点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语义上行策略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曾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而且似乎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若我们转而讨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

第四，“语言转向”包含了很多思想，很多尝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疑问。语言转向转到头来，似乎不过在主张：所谓哲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语义问题。大量甚至所有哲学问题，可以靠查字典加以解决，哲学研究变成了语义学的工作。由于发生了语言转向，厘清哲学和语义学的区别就变得格外重要。语言转向厘清了哲学与物理学类型的科学的界限，却仿佛使得哲学和语言学变得难以区分了。要防止哲学误入语义学，一个简便的办法是不要把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称作语言研究，而采用概念考察这个名称。所谓概念考察，主要是考察论理词

第五，陈教授分析了为什么要语言转向？从根本上，只有一句话，语言是人类的基本理解方式。语言中不仅包含着世界的道理，而且包含着我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语言是用以理解的东西。对语言的考察本身就是反思，反思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通过理解一种语言来理解世界。这一点，涉及所有社会科学。语言的特点在于，语言是公用的、通用的。同时，对于道理的引申来说，语言是中立的、中性的。



讲演结束后，童世骏教授首先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语言哲学大体上是介于形而上学和心理主义之间的一种路径，其反对本质主义、虚无主义和纯粹的情境主义。他同意陈教授的下述观点：对语言的考察本身就是反思，反思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但他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例说明，哲学反思的对象不是“山”和“水”这类知识，而是“仁”和“智”这类知识；因为后者涉及到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能力，即区分规范性知识与认知性知识的能力。同时，他还就“语言转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可能不同含义、陈教授所谓的主要以是否与认知者有关为标准对“冷热语言”与“温度计语言”之间做出的区分等提出了疑问。

接着，孙周兴教授做了点评。他在对中国学界对“语言转向”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主要就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态度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反动，经历语言转向后的 20 世纪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大词”的拒斥和对“小词”的偏爱；但是，语言哲学之前的形而上学对“大词”讨论之失败并不构成我们不讨论那些“大词”、转而讨论某些“小词”的理由。同时，他还结合海德格尔关于“动词文化”向“名词文化”转变的观念对陈教授对“副词”的关注进行了评论，并就陈教授对“哲学”与“科学”之区分的观念进行了阐发。



讲演点评之后，在场听众向陈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如语言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哲学中的时间概念，语言转向与范式的关系，语言转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作用，语言学中人称代词的转变等等。陈教授给与了耐心的回应和解答。

演讲结束后，陈嘉映教授、童世骏教授、孙周兴教授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邵敏编辑一行在邓正来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高研院。同时，邓正来教授向客人介绍了高研院的学术定位、规划与目前发展状况，并与他们就中国思想界的动态和走向、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八. 双周学术午餐会（第五期）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五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5月15日中午12:0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高研院2812室“思想者学苑”举行第五期双周学术午餐会。本期讨论主题为“现代化概念及其中的理性错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遐龄担任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王英、王鹏宇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Julie Zeng 教授应邀参加本次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主持本次学术午餐会。刘清平教授、王勇博士、孙国东博士、陈晔老师、黄倩老师和龚智慧同学参加了讨论。

谢遐龄教授首先就“现代化的概念及其中的理性错位”这一主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追溯了“现代化”概念提出与运用的历史, 强调“现代化”的实体性含义和当下意涵, 并进而谈及到“现代化”的前提预设即在于其与生俱来便企图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作出高低优劣的价值评判。正由于这一预设, 谢遐龄接着指出现代化的动力作用就是模仿。可以是模仿制度, 也可以是模仿技术, 然而模仿者自身会产生一种过滤机制从而把制度、技术所需的精神内涵过滤掉了。因此, 模仿到一定的程度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理性错位。以中国为例, 实践理性被理论理性所取代, 模仿变成了单纯的利益取向而缺少了实践理性内涵, 这就要求哲学来对这种错位进行新的建构和诠释。



接着与会者就谢遐龄教授演讲中所提到的概念问题、理论问题以及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诸如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问题、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与现代化的趋同性问题、文化相对论对现代化有效性的批判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等等。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 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三位嘉宾, 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

用餐时另两位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加以思考讨论，推进高研院学术研究，促进跨学科同行间的交流。

九．青年学术沙龙（第五期）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第八期）

5月20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青年学术沙龙”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八期讨论。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席天扬，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沈奕斐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朱剑峰博士应邀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任军峰博士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沙龙。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出席沙龙的演讲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并为四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青年学术沙龙演讲嘉宾聘书及赠送了高研院图书。



首先，席天扬做了题为“美国大选政治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讲演。他首先分析了2008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体现出的新特征，而后阐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在美国的表现，最后，进行了自“里根时代”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政策方面的比较。

沈奕斐博士的主讲题目为“从‘家族主义’到‘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家庭内部交易”。她首先分析了现在年轻夫妇家庭内部个体化特征的表现，接着，分析了在当今社会变迁速度飞快的时代下，个



体化进程中社会支持的缺失，最后，向听众呈现了“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司徒佳副教授的讲演以“见闻、游历与讽刺诗——论洋泾浜英语在欧美的历史形象传递”为题，首先，她指出洋泾浜英语发源于18世纪中后期广州澳门一带，在和洋商买卖交易中产生的破碎蹩脚的英语。第二，她阐述了研究的方向和目的，希望从近代欧洲旅行记、回忆录以及19世纪在华的外国人的记载中来反映他们对中国社会本土文化的看法，研究西方文件中的记载、方式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外国人记录的行商之间的对话实例，不仅能够满足读者对洋泾浜英语的好奇，而且具有实景感，具有语言参考价值。

朱剑峰接着做了题为“‘身体’到‘生命’：当代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简介”的讲演。第一，她向听众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及容易产生的误解；第二，阐述了“身体”的理论框架及三个身体的划分，即个人身体、社会身体和身体政治。第三，剖析了对应三个身体的三个理论视角，即现象学分析、结构主义和象征主义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最后，她指出现代性的医学人类学的前沿，即关注生命，什么是好的生活？养生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四位嘉宾讲演之后，在场听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疑问，如美国大选投票的新特征，家庭理念的变化与社会转型，宗教观念与美国选举，洋泾浜英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医学人类学与儒家文化，家庭观念与儒家文化等等，听众与讲演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任军峰副教授针对四位嘉宾的讲演做了沙龙总结。第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三个概念在不同时代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背后都有对应的社会基础；第二，对于家庭理念的问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第三，语言本质上体现了身份的问题，身份又引出了广义的政治问题；第四，医学人类学实质上是学科建设的问题，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中国人的幸福感从哪里找”这类问题，应该从中国自身的脉络里找，将历史贯穿起来研究。

青年学术沙龙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进行自由讨论。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十. 媒体报道

《社会科学报》刊发“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论文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社会科学报》5月14日

【按】2009年3月2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Center for US-China Policy Studies、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协办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Roundtable: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在高研院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社会科学报》5月14日编辑刊发部分与会学者的文章。

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徐 勇

- 农民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以自己不合时宜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政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这一系列的自主行为最后导致拉开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大幕。

- 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对体制的冲击是不可能产生的。

- 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创新者。由农民的自主行为引起的制度变迁，既是传统政治行为经典模式无法解释的，也是改革后引进的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且至今农村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国家。中国政治本质上是农民政治，中国的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中国改革也是由农民率先突破传统体制的。从1950年代到20世纪末，正是农民的自主行为，一步步地突破体制的限制，改变着政策和体制，促使“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在当代中国，率先突破体制束缚的为什么是农民？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是：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但这一两极化的经典模式已很难理解当代（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

农民与国家：对抗或依附

在传统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表现为分散的小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说是“顺民与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由此也形成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反抗、顺从—叛乱的分析框架。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依从者，要么是反抗者。

马克思从法国小农的经济社会分散性特点出发,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保守性。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认为小农政治行为模式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对于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积极行动者。

20 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的经典模式来认识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农民的消极抵制和中国农民的积极革命,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则系统论述了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美国另一个著名学者斯科特,则以第三世界农民的日常反抗为样本,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

以上的研究主要是以 20 世纪 70 年代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农民政治行为为对象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政治行为。但他们运用的分析框架仍然是经典模式。如美国学者欧博文及其指导的学生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的观点,于建嵘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依理抗争”的观点。

农民政治行为孕育着改革的机会

经典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他们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为的盲目依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从 1950 年代的“生产力暴动”包产到户,到 1960 年代被视之为“投机倒把”的流动商业行为,一直到 1980 年代的“红帽子商人”农民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以自己不合时宜,甚至与国家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自主行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促使国家政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这一系列的自主行为最后导致拉开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大幕。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行为模式的特定制度背景。从根本上说,农民对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认同的,即使是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也没有采取激烈反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一般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要饥饿引起大面积民不聊生,必然引起农民起义和叛乱。三年困难时期未出现激烈的反抗这一事实因此成为西方学者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不解之谜。”其实这一

谜底就在于经历长达数十年农民革命以后，农民对于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是基本认同的，并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但是，农民也不是一般的政治盲从和依附者。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机械的叠加，两者利益不仅有差别，甚至有冲突。这主要是特定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而在以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政策和体制下，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的损害更多一些。于是，正是农民，而不是理论上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特定政策和体制的不认同者，直至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表达自己与政策和体制意志的不同的要求。

传统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更多的是将农民作为破坏者的面目展现的，无论是改变统治体系，还是使政策受到蚕食；是“依法抗争”还是“依理抗争”这的确是传统农民政治行为的特征。农民作为传统生产方式的承载者，他们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屈从或者临死反抗，其结果只是改变个人命运，而不是改变决定他们命运的制度。这正是马克思将农民视之为保守者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不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引发了整个制度的变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当然，我们不是说农民有多么高明，农民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变迁行为。但是，农民的行为确实使执政者意识到政策和体制的不合理性。正是农民一系列、持续不断的自主行为，使当政者反省：为什么我们主观上是为人民谋利益，客观上却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拥护；为什么“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农民却不听教育，仍然自行其是。越是接近农民的基层官员，这种反省越早越强烈。这正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基层官员保护和主动支持农民自主行为的重要原因。后来，这一反省上升到执政高层，于是有了1960年代中央高层中的相当多数人对包产到户的赞同和支持。直至1970年代末，以中央高层领导下，主动展开全面改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对体制的冲击是不可能产生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创新者。由农民的自主行为引起的制度变迁，既是传统政治行为经典模式无法解释的，也是改革后引进的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的。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不该再用旧标签看待变化了的中国政治

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中国不应该只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

在中国，学者一般接受邹谠教授关于毛泽东时期的“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说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国演化为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比较多的说法应该是威权主义。我认为，在权威主义或类政体的政治中，有些政治学理论是不适用的，比如政治系统理论是西方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假设，政治过程就是政府依据民众的要求与支持而制定公共政策的系统性过程。显然，政治系统理论不适用于威权政治，更不可能是极权主义政治。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系统理论是有其分析价值的。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更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越来越多地体现民意的压力，而不是传统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正如王绍光所说的，这种政策议程设置的变化意味着，“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

我们为什么依然用一些旧标签而看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了的中国政治？政治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旧制度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比如政体类型的旧制度主义属性。古典主义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依然有很多不能忘却的遗产，比如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传统，但是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经常被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太僵化、太形式化与法律化、分析性不够、不具备真正的“比较性”并且忽视了政治与变迁中非正式与动态的面向。从政治过程来看，难道能够改变政策走向和设置政策议程的政治不是民主的？从政治-经济关系上来看，利益集团政治的出现难道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变量？中央-地方关系中联邦主义下的权力共享难道不是民主政治？

更重要的是，当先贤们建构他们的政体论时，何曾会想到技术对政治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果说民主政治的终极价值在于基于民意的善治，那么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即使不是选举的替代性工具，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渠道。

概言之，虽然西方政治学早已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并经历理性选择主义的洗礼而走向新制度主义，但是在政治学的最根本问题即政体论上，依然是基于城邦国家规模而又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用流行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体论文量一切国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中国不应该只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已经发生结构性变革。简要地说，共产党正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其标志是制度化与法治化；在政府体制上，6次重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并保护了市场经济，利益集团政治因而得以出现；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形成了政治-经济二元化结构，即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主义；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新型民间组织和互联网），出现了统和主义政治。

观点集萃

胡 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未来政治发展要平衡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

新制度主义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由外及内的变迁，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体制外”改革。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推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变革。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发展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采用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先外围后向核心推进的方式。这种制度变迁生成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优先与政治稳定优先的发展路径，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改革策略也完全契合。它帮助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建构，要把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机统一起来，辨明市场化取向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好地平衡体制外（边缘）改革与体制内（中心）改革、民主与效率、市场化与民主化、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有效性与合法性等价值和目标。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间断—均衡”改革方式或许大有可为

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一般都推崇渐进主义，“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摸着石头，水深了不敢过河，渐进往往成拖延改革的借口。“休克疗法”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结果是渐进不进，一筹莫展。可以另辟蹊径，在改革政策议程设置上采取“间断——均衡”方式，一个时期抓住一个改革政策议程，重点突破，等待大体平衡之后再上一个政策议程，这样可能会有起色。“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府的改革政策议程在多数情况下维持着一种垄断的状态，或者说是稳定均衡的状态，很少发生变化；但是在相关变量发生变化以后，政策议程垄断会受到冲击，议程的稳定均衡状态会被打破，从而发生急剧的或者明显的改革变迁；直到形成新的政策议程垄断，即产生新的政策议程均衡状态。而影响改革变迁的相关变量，主要是议题界定和制度控制。这种理论和改革方式，或许能够大有可为。

陈周旺（复旦大学副教授）

中国政治学不应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

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也就是拿美国现成的理论来套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全然忽略这些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事实上，那些推崇西方模式的学者，若真的持“西方中心论”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心目中的“西方”都是被美化了的“西方”，是一个经过知识殖民化的扭曲形象。对本土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并不是让中国政治学倒退到地方性，相反是透过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为政治学提供普适模型，其雄心不在中国本土，而在于从中国出发，建立普遍化理论。

《社会科学战线》刊发邓正来教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刊发邓正来教授学术专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中，邓正来教授指出，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

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论文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为题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探讨。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时代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经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论文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着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而作为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确实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为了履行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并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